

缩短两会时间不应成为节约措施

陕西省政协十届二次会议12日上午在西安召开。本次政协会议整体体现了节俭的原则,上会的工作人员压缩20%,总体预算减少20%,报道称,这次会议有可能成为陕西省历史上最节省的一次政协会议(《华商报》1月12日)。

现在正逢金融危机,公权机关应该带头过紧日子,召开两会坚持节约的原则,显然是必须的。陕西两会在这方面提出了硬措施,例如:此次省政协会议力争减少会议经费200万元。大会服务工作全部由政协机关职工承担,仅此一项,就省出宾馆的房间近百间。往次会议期间的各种宴请也叫停,除了安排一次港澳侨委员宴请外,不再安排别的宴请。会议期间,政协委员、列席代表和工作人员全部吃自助餐。

应该说,这样良好的会风形成后,就是不遇到金融危机,也应该坚持,从前是,将来也是,尽量为纳税人节省每一分钱。

但是,新闻中有一个说法却让

我很疑惑,那就是,有关方面把缩短两会的会期也当成了节约资金的一条重要措施。陕西华商报的新闻标题就是“09年陕西两会提倡会风节俭会期压缩预算减少”;还有一则报道的也提到:“此次省政协会议力争减少会议经费200万元。据悉,

会期的长短只应该服从会议内容的要求,不应该为了省钱而压缩会议时间。如果人为地缩短两会的时间,就可能影响会议的质量,使人民的权力在结果上被削弱。

本次会议会期4天,比往次会议少了2~3天。另外,大会服务工作全部由政协机关职工承担,仅此一项,就省出宾馆的房间近百间。”这里,缩短会期甚至成了节省的主要措施,其他措施反而属于“另外”了。

我以为,一年一度的两会是法律的规定,是我国人民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载体。开好两会,具

有重大的政治意义。两会需要开几天,应当按照会议需要讨论、审议、决定的议程确定,就是说,会期的长短只应该服从会议内容的要求,不应该为了省钱而压缩会议时间。如果人为地缩短两会的时间,就可能影响会议的质量,使得人民行使权

利的过程在实际上走过场,从而使人民的权利在结果上被削弱。如果确实是因为今年的两会选举任务不多,因而可以减少掉部分时间,这是可以理解的。而如果只是为了省钱而缩短,则是完全错误的。我们说,会期的长短只服从需要,不能服从节约。

还有一种说法我们也很常见,

就是两会缩短了时间,于是提高了效率,甚至说“让代表腾出更多的精力投入工作中去,体现了高效务实的精神”,这也是很不通的。凭什么说缩短了时间就能提高效率?当然,可能的情况是,过去会议时间长,结果并不是审议报告,而是东游西荡,甚至拉关系去了,还不如把这时间压缩掉。这只能说明过去会议的效率不高,需要研究解决,岂能因为不认真审议,于是就干脆不审议了?至于“让代表腾出更多的精力投入工作中去”,委员代表们天天在第一线工作,不要再把会议的时间腾给他们工作了。如果连开会的时间也可以大量节省,那么两会的会期就有必要重新调整了。

既然两会会期是议程的需要,就不能为了节约而缩短会期,也不能把缩短会期说成提高效率。如果会议“缩短”变成人民的权力“缩水”,这就牵涉到我国两会制度的发展问题了,事关我国的政体,还是严肃一些好。

一语惊人

ATM机吐9张假钞?

“战机坠毁说法毫无根据”
——成都军区回应重庆巨响,称未发生任何飞行训练安全问题。
出处:新华网

“结束了?”
——重庆政协闭幕会仅用22分钟,参会者感到吃惊。
出处:《重庆晨报》

“请你洗澡”
——马鞍山市洗浴业发达拟建“中国浴城”,当地流行请客洗澡。
出处:《新安晚报》

“执法人员一来,老板就说剩菜是卖给别人喂猪的”
——海口火锅店服务员爆料内幕:底料是吃剩的“猪食”。
出处:《海南特区报》

“只好自认倒霉”
——绵阳市民从ATM机取出9张“HD95”假钞,称无票据只能作罢。
出处:四川新闻网

“本姑娘也戴眼镜,我担心眼镜阻碍我们接吻速度”
——在读女博士生网上列10条择偶标准,包括男方不戴眼镜等。
出处:《新闻晚报》

“万一有孩子总要负责任”
——刘德华默认有女友,若对方怀孕一定负责。
出处:上海《文汇报》

“我看着她在水中折腾到塘中间去了,还嗷嗷地叫”
——南京男子为娶卖淫女淹死智障妻,冷看老婆水中挣扎。
出处:《现代快报》

“我很想谈场恋爱”
——重庆24岁美女钢琴老师患癌,称为了事业曾放弃谈情说爱。
出处:《重庆时报》

木桦 辑

教认假钞并非卸责

“HD90”仍是媒体关注的焦点。前天,重庆一对农民工夫妇在老家才发现,他们2400元的工资中有1900元是假钞。昨天“广州鞋贩称摆摊卖鞋时收到8张HD90假币”(《新快报》1月12日),这些消息表明,社会底层人士比较容易受到假钞的侵害,原因应当是他们识别假钞的能力较弱。

据传,“HD90”字头的假钞仿真度较高,一般验钞机都难以识别。但“深圳现HD90假币,超市为验钞设三关”(《晶报》1月12日)的报道却对上述传言提出了怀疑。记者称HD90假币可以被验钞机识别,并非传言中的那么神。果真如此的话,那么我认为,很多人反映HD90假币难以识别的原因只能有一种解释:验钞机有问题。对此,国务院反假币联席会议办公室已从侧面证实,该机构秘书处处长潘秀曾透露,目前国内点钞设备的生产企业大约有120多家,其中只有少数企业的技术标准达到国家质检总局的要求,市场甚至存在成本仅40元的验钞机。

但不管验钞机技术水平如何,打击假钞的重任并不在于机器,而在于人。毕竟,人们在频繁的货币交易中,不可能每人随身带一验钞机。正当舆论普遍抱怨全国的金融机构与警方打假行动迟缓之际,传来了广州警方介入打假的消息:“广州商家频中招,警方立案调查假钞”(《广州日报》1月12日)。警方介入打假固然重要,不过我认为,一味指望验钞机的精确性与警察的力量,还远远不够。虽然有专家说银行注重教会公众识别假钞的方法是推卸责任,但我认为银行继续加大识别假钞的宣传力度是极为重要的,其宣传甚至应普及到偏远地区的农民。唯有如此,才能让假钞的生产失去意义。目前,大量假钞已流入市场,让全民形成拒假防火墙显得尤为迫切。

临近春节,货币交易愈加频繁,防止假币固然重要,但安全生产更应引起警惕。“英德私人鞭炮作坊爆炸致5死10伤 该作坊曾被查处”(《信息时报》1月12日)。此类惨剧几乎每年春节前都会上演。无良老板自然是罪魁祸首,但职能部门同样有失职嫌疑。如报道所示,出事的鞭炮作坊已经被查过一次,按理,惩罚机制应当有一定的惩前毖后作用,即使没有,职能部门也应当对该作坊定点监管才对。

“东莞女子洗澡打开热水器被电死 商家愿赔偿12万元”(《广州日报》1月12日),这条消息提醒我们,面对产品质量(包括安装质量)引发的伤亡事故,仅靠赔偿来解决是不够的,应当给予刑事追究——如果赔偿可以解决伤亡问题的话,那么就为商家的玩忽职守(甚至故意伤害)留下了通融的余地。

“广东力促毕业生就业,基层干2年考公务员优先”(《广州日报》1月12日),作为一项民生政策,其出台背景是非常适宜的。在就业形势紧迫的当下,大中专学校毕业生就业仍偏重大都市而轻视乡镇基层,此观念确需政府引导。不过,政府着力强调“考公务员优先”,是不是有一种将公务员职位当奖赏的意味?会不会进一步强化公务员的优越性?在“公务员热”热得发烫的当下,政府应适当做降温工作,而不是相反。

时事关心

飞机榄

公共场所“控香水”很不靠谱

在一次朋友聚会中,家住番禺区的刘小姐抱怨说,最近一个月一想到上班就害怕。原来,每天和她坐同一班次楼巴上班的业主中,多了一位爱擦浓烈香水的邻居,那味道熏得整车人“快要窒息”。话刚说完,同桌几个男同胞亦大吐苦水。于是大家提议,香水的办法,在公共场所也“控香”(《羊城晚报》1月12日)。

上述众人的遭遇,我也有。在一次次的公交际遇中,我总能碰到一些时髦人士,洋面孔,本土姑娘都有,浓妆艳抹且不说,香水扑鼻,让人难于呼吸是常事。此时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躲避,或向车厢的纵深处挤过去,或用衣衫掩鼻。这或许就是“香水有毒”的另类版本了。

香水本是好东西。按弗洛伊德的性学说,再加上我的经验猜

度,香水基本上就是诱使自己的荷尔蒙盛放,刺激别人释放大量的安多酚(人类感知幸福与快乐的主要神经传导物质)的引子,以带来狂喜迷醉的亢奋感。当然,我也很理解外国人或是时髦人士对香水的依赖和迷恋,但我只是希望这香水不要浓烈到像杀虫剂、瓦斯一样可以熏倒人,因为任何东西过度了就物极必反。而且,这公共场所喷洒的香水,自然不能像斗牛士那般天天舞着红布,情挑公交车上的男女老少。一句话,我尊重你洒香水的自由,但我也请你尊重我闻不得浓烈香水的权利。

但要论及借鉴“控烟”的办法,在公共场所“控香”到底靠不靠谱,我只会表现出悲观来。你想“控烟”这事都半生不熟,现在再弄个“控香”,效果肯定不好。更何况,要是有一天真“控香”了,恐怕这执行起来也有相当的难度。大家不妨想像一下这样的场景:

公交车司机首先做第一把关人,闻之沾染浓烈香水者即拒绝乘车;假如哪位香水大人蒙混过关,乘客即是第二把关人,全车人立马将其隔离驱逐,此香水大人即惶惶似丧家犬。然,这般作为却不人道。如若像控烟一样处罚,则更不靠谱,因为公交司机和乘客都没有执法权,而车上总不可能都配一个城管吧?

所以,一些市民对于公交车上“控香”的提议,我只能说这是一厢情愿,不切实际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束手无策了,我们或者可以用道德规范的角度去思考解决之道,比如可以在单位这种小范围的场所先开始适度“控香”,出台相关规定,培植人们的环保意识,鼓励减少香水使用量,减少空气污染;再比如可以营造一种道德氛围,让那些有洒浓烈香水习惯的人有约束感和羞耻感,从而使他们有道德的自觉。

很,有点撑不住了。”回到家里,他又告诉妻子说:“这两天感觉很累,我怕是快要死了。”这样的细节,或许是要反证段大军的伟大。但我总觉得,这样的反证是残忍的,面对一个年轻警察的累死,“英雄”之类的称号是苍白的,因为,段大军原本可以不死,如果他不这么拼命工作的话。

再耀眼的称号,都不如生命来得珍贵。有人说,社会进步的历程,就是不断恢复人性、尊重人性的过程,我觉得很对。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,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却不断教育每个普通人要“舍小我,为大家”。在这样的价值观下,教师累死在讲台上、医生累死在手术台上,总是要被当作英雄歌颂的,就像现在的段大军一样。段大军们当然是英雄的,但当代社会不该再出现这样的英雄了。他们的高度,并非一个普通人所

能企及。累死的英雄们,除了值得敬佩之外,还值得这个社会反思:为什么他们会累死?让他们活下去难道是件困难的事情?如果仅有歌颂却缺乏深刻的反思,那么我们的生命价值观一定是有问题的,需要下力气调整。

价值观是一个社会的外衣。一个社会,除了要保证坏人的生命,也要保障好人好好活着。一个普通人,能够守法尽责,就是最大的社会道德,先保护好“小我”,才谈得上为“大家”作贡献。段大军死了,他死在了连续工作8天之后,他死在了工作岗位上,或许,他也是死在那传统的道德重压之下。单纯地把他当作英雄来歌颂,是很容易的,一荣俱荣,当然符合当地警察形象。但在对段大军表达敬佩的同时,反思这个社会对非正常牺牲英雄的追捧又是如此的重要。

华夏透视

赵勇

不要再歌颂累死的英雄

连续工作8天后,年仅43岁的河南南阳市枣林派出所所长段大军累死在走访途中,医院诊断其死因为心肌梗死(《人民公安报》1月12日)。

“累死在工作岗位上”毫无疑问是我们印象中的传统英雄标识之一,报道中因此作出了如下介绍:段大军曾连续两年被评为河南省优秀人民警察。他刚直不阿,严于律己,恪尽职守,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,深受辖区群众的赞誉——不错,段大军是个令人敬佩的人。但我总觉得,“累死在工作岗位上”不仅是一个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,它更多的应该是一个值得追问的悲剧:为什么这个社会要让一个好人活活累死?

报道中同样提供了这样的细节:段大军生前曾预感到自己要累死,他曾对指导员说:“我累得